



华中语学论库 第六辑

◎邢福义 主编

官话方言的多维研究

汪国胜 苏俊波 主编

华中语学论库（第六辑）

邢福义 主编

本书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华中师范大学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成果

官话方言的多维研究

汪国胜 苏俊波 主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年·武汉

新出图证(鄂)字1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官话方言的多维研究 / 汪国胜, 苏俊波主编. —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11

(华中语学论库第六辑)

ISBN 978-7-5622-8022-4

I. ①官… II. ①汪… ②苏… III. ①汉语方言—研究 IV. ①H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75860 号

官话方言的多维研究

© 汪国胜 苏俊波 主编

责任编辑: 陈丽琼 刘晓嘉

责任校对: 刘 峥

封面设计: 罗明波

编辑室: 高校教材编辑室

电话: 027-67867364

出版发行: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社址: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 152 号

邮编: 430079

电话: 027-67861367 (发行部) 027-67861321 (邮购)

传真: 027-67863291

网址: <http://press.ccnu.edu.cn>

电子邮箱: press@mail.ccnu.edu.cn

印刷: 武汉华工鑫宏印务有限公司

督印: 王兴平

开本: 787mm×960mm 1/16

印张: 25

字数: 410 千字

版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定价: 58.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 欢迎举报盗版, 请拨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序

邢福义

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达，语言学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展示出强大的活力和能量。中国语言学是世界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对中国语言学事业有所推动，我们组织撰写“华中语学论库”。作为专用名称，这里的“语学”主要指汉语语言学，近期的15年时间里以现代汉语语法专题研究为重点。“语学论库”，这是汉语语言学研究的一个系统工程，如果将来主客观条件具备，在研究范围上可以不断扩大，在研究时间上可以无限延展，在研究队伍上可以辈辈交接，代代传承。“华中”一词，既跟研究队伍的华中群体相关，又跟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名称相关。

汉语语言学源远流长。千百年来，特别是《马氏文通》出版以来，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由于一代代学者的不懈努力，汉语语言学沿着“创业—拓新—发展”的轨道不断推进。目前，汉语语言学所统括的汉语语法学、汉语语音学、汉语方言学、汉语词汇学、汉语语用学等学科，都已出现了初步繁荣的喜人局面。

但是，初步繁荣并不意味着已经成熟。对于语言学这样一门社会科学来说，成熟与不成熟的突出标志，应该是学派或流派是否已经形成。在这一点上，科学跟艺术情况相同。比方说，我国的京剧表演艺术已经达到了成熟的高峰，最基本的表现就是形成的这“派”那“派”，只要一提到“梅派”和“程派”，稍有京剧表演艺术知识的人就会知道这是两个具有各自特点的著名流派。又比方说，我国的书法艺术早已达到了成熟的高峰，最基本的表现就是形成了这“体”那“体”，只要一提到“颜体”，稍有书法艺术知识的人就会知道它是不同于“柳体”“欧体”等的有独特风格的书写体，甚至还会知道颜真卿打破了“书贵瘦硬”的传统书风，开创了二王体系之外的新体。然而，汉语语言学的各门学科，即使是其中发展速度最快的现代汉语语法学，仍然缺乏显示成熟的任何标志，距离真正成熟实

际上还十分遥远。

当今的汉语语言学，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二求”：一求创建理论和方法，二求把事实弄清楚。这是互补互促而又互成因果的两个问题。没有理论和方法的成熟，一门学科不可能是成熟的。而理论和方法的创建，是学者们长期深入研究的成果，是有效地进行群体性思考、独立性思考和开拓性思考的结晶。因此，必然带有鲜明的个性，带有学派的印记，反映一派学者的思想体系、研究特点和总体成就。另一方面，没有对事实的清楚了解，理论和方法的创建便成为空中楼阁。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来说，之所以至今尚未成熟，自成体系的理论和方法之所以尚未创立起来，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对事实的了解基本上仍然处于朦胧的状态。真正适合于我国语言文字的理论和方法，最终只能产生在我国语言文字的沃土之上。因此，应该强调“研究植根于汉语泥土，理论生发于汉语事实”。不然，我国的汉语语言学在世界语言学中就可能永远处于附庸的地位，就永远不会有跟国外理论对等交流的时候。

学术派别的产生，起码应该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有特定的学术领地，提示标志性的理论和主张；第二，有鲜明的治学特点，形成一套自己的研究方法；第三，有良好的学风，形成一支富有活力的队伍。近年来的研究状况表明，我国的学者们已经或多或少地显示了各自的风格特点，但是，顶多只能说其中孕育着某些派别意识，或者顶多只能说预示了某种派别意识的萌芽。汉语语言学的真正成熟，需要经历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有赖于众多的学者群策群力，更有赖于一辈一辈的学者发扬愚公移山的接力精神。我们华中研究群体人数很少，力量单薄，起点不高，功力不足，对于汉语语言学的发展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但是，我们愿意跟在前辈学者的后头，跟在全国各地学者的后头，尽心竭力地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如果把建设富于特色的汉语语言学比作建筑一座大厦，那么，我们组织撰写“华中语学论库”，便是想为这座大厦的建筑献上几根钢筋、几块石头。通过参加大厦的建筑，使我们这支小小的队伍受到训练，这是我们的最大愿望。各部著作在内容上具有独立性，但我们希望，在出版了以上二十部之后可以看到研究风格上的某些特色和理论方法上的某种网络。

“华中语学论库”的撰写和出版，得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年初，出版社社长朱峰先生和中文编辑室主任陈昌恒先生到我家，鼓励我牵头编写一套关于汉语语言学的丛书，要我拟订一个初步的计划。不

久之后，新上任的总编辑王先霈先生了解了有关情况，立即审定计划，并且从内容到选题都提出了好些中肯的意见。他们为发展学术事业所作的决策，他们在出版事业上的决心、魄力和历史责任感，不管是对我个人还是对华中语言研究群体的所有成员，都是极为有力的鞭策。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贵在努力，贵在坚持！

1996年5月4日

目 录

说“摆事实讲道理”	张振兴 (1)
从现代山东方言的共时语音现象看其历时演变的轨迹	钱曾怡 (11)
随州方言的异读	刘村汉 (30)
再论古入声今调类在官话方言分区中的作用	桑宇红 (48)
西南官话湘南片“新田官话”音系及特点	谢奇勇 (68)
陕西西乡方言的语音差异及混合特征	周 政 (80)
陕西汉阴方言的语音特点及内部差异	张德新 (92)
皖北阜阳方言古入声字今读探析	叶太青 (104)
满城话两类不同的连读变调	唐健雄 (115)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关方言同音字汇	阮桂君 (128)
关于方言基本词汇的比较和方言语法的比较	李如龙 (151)
非核心地区官话词汇的演变	鲍厚星 (161)
湖北黄冈话的“搯子”	孙玉文 (168)
“睇”的语义历时演变	邵则遂 王平夷 (183)
现代汉语方言中的“筷子”和“箸”	罗自群 (190)
口语高频词比较的方言分区意义	岳立静 钱曾怡 (200)
衡南话特殊字词辨	罗积勇 (210)
晋方言“父亲”类词语的地理分布与历史层次	白 云 杨 萌 (232)
大冶方言的“在里”和“过来”	汪国胜 (247)
湖北仙桃话强调高程度性状的“X 哒”结构式	储泽祥 刘 琪 (253)
通山方言的“V (了) 一下”	范朋颖 范新干 (267)
河南陕县方言源于性器官名称的情感助词	张邱林 (275)
固始方言的“可”字句	汪化云 李 倩 (288)

陕北绥德方言的“把”字句	黑维强 (295)
从认知角度看鄂东方言的主观不满意量	陈淑梅 (308)
湖北安陆方言的后置语法成分	盛银花 (314)
鲁山方言的相对程度副词“通”	孙红举 (325)
“A 不 AB”与“AB 不 A”两种反复问句的统一处理及相关的句法 问题	徐 杰 田 源 (336)
复句关系标记在何处关联	朱 斌 伍依兰 (354)
偏称宾语处置式的句法地位	李思旭 (370)
后记	(392)

说“摆事实讲道理”^{*}

张振兴

提 要 本文从汉语方言研究的角度谈语言研究要“摆事实讲道理”，认为“摆事实讲道理”是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一条基本法则，这个法则是由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本体论和方法论所决定的。

关键词 事实 道理 汉语方言 调查研究 基本法则

一 从文献看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进展

最近一百年来，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积累了极其丰富的成果。根据《汉语方言研究文献目录》大略的统计，截至1994年，国内外汉语方言文献目录已多达6,000多种。其中，方言通论性质的有450多种，官话方言2,000多种，晋语300多种，吴语600多种，徽语30多种，赣语150多种，湘语150多种，闽语900多种，粤语400多种，平话土话30多种，客家话300多种，其他类方言200多种。

1994年至2010年是汉语方言调查研究发展最为蓬勃的时期，新增的方言文献目录估计不会少于3,000种，其中晋语、平话土话、徽语的研究文献比例增速最快。

就是说，到2010年为止，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文献多达上万种。在中国语言学的各个学科文献数量中处于领先地位。其中《现代吴语研究》《湖北方言调查报告》《昌黎方言志》《中国语言地图集》《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汉语方言大词典》《汉语方言音库》《汉语方言地图集》等一批标志性重大研究成果在推动汉语方言调查研究学科的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 本文已发表于《汉语学报》2012年第3期。

用，在国内外学术界受到广泛重视。

客观地说，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在近 30 年来取得了重要进展。

二 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本体论

汉语方言调查研究取得重要进展有很多原因，在这里不一一详说，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学术界一贯高度重视汉语方言本体的调查与研究。语言研究的本体是语言本身；汉语研究的本体是汉语本身；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本体是汉语方言本身，这就是本体论，汉语方言的本体论。

从汉语方言的本体论出发，我们强调三条：

（一）调查研究首先就得调查。这个调查就是田野调查，而且严格讲是实地调查、实地记录，绝对不能拿自己的印象去代替调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方言的调查研究首先是一种能力。检验一个方言工作者、一个方言学的研究生（无论是硕士还是博士）是否合格，首先就看他有没有这个田野调查的能力。

（二）田野调查的目的是获取方言事实。方言事实是方言研究的基础，没有方言事实的“方言研究”或事实是错误的“方言研究”是不会得到承认的。方言研究拒绝没有事实或事实错误的一切调查研究“成果”。在这一点上对于任何一个研究者（不论他或她是新手还是名家）都是平等的。

（三）要尊重事实，观察事实，切忌主观想象，不要先入为主。研究方言首先要观察自己所知道的、所熟悉的方言的事实，但一定不要用自己知道的方言事实或书本知识或教室里讲的金科玉律去衡量甚至怀疑其他方言、其他语言。大家都知道“说有易，说无难”这句话，其实也是说语言研究要从事实出发，不要先入为主。曾经发现有人为了验证自己所说的理论如何好，如何正确有效，而无视事实甚至修改事实的例子，这是要不得的。

以上三条是建立在语言本体论的基础上的，也是建立在对汉语方言实际情况的认识的基础上的。从认识论的观点看，汉语方言的最本质特征是它的共同性和分歧性。“自其同者而观之，隔好几千公里还能通话”，这说的就是共同性；“就其异者而观之，同一个县有好几种不易互相了解的方言”，民间说“五里不同俗，十里不同音”，这说的就是差异性。官话方言的韵母一般只有 30 来个，可是河南北部的晋语，其韵母上百个的有的是，

广东的潮汕话和福建的厦门话的韵母也接近百个；青岛、烟台、银川、乌鲁木齐等地的方言声调只有3个，可是广州话的声调多达11个，广西博白一带的方言除11个声调之外，还有很多字的声调归不进去。同样是吴语，上海话的单字声调只有6个，可是江苏吴江话好些地方的声调多达12个。这些都可以说明汉语方言的共同性和分歧性。汉语方言里这样的事实太多了，语言事实太复杂了，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天真的议论不能当真。

三 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方法论

以上是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本体论，最关键的就是四个字：“调查”和“事实”。有了调查才能有事实，事实是调查得来的，没有调查就没有事实，没有事实，就谈不上任何语言研究。

哲学基础告诉我们，是先有本体而后有方法的，方法论以本体论为出发点，又以本体论为依靠。哲学基础又说，方法论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每一个具体学科都有自己的方法论。对于具体的学科来说，方法论说的就是方法，就是研究的方法。因此，我们可以在上面所说的本体论的基础上具体讨论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方法。总的来说，这个方法就是“纵横比较分析法”，也可以叫作“共时历时比较分析法”。

“纵横比较分析法”简单说是一种“十”字形的比较分析方法。纵的一行表示纵面的、上下的，也是历时的比较分析；横的一行表示平面的，左右的，也是共时的比较分析。纵的比较分析看方言的古今状态，看方言的历史演变状态，看方言的历史演变趋势，这就是所谓“鉴古知今”，从今也可以推及古；横的比较分析看方言的现实表现，看方言之间的接触和影响，看方言与共同语的关系，这就是所谓“左邻右舍”，从我知彼，从彼证我。因此，“纵横比较分析法”上下左右全面照顾，是一种立体的、综合性很强的研究方法。纵横之间，“十”字形中间有一个交汇点，是古今左右的结合点，这一点往往成为方言研究的亮点。从这个亮点出发，可以研究方言的很多方面，例如可以从这里预测方言的未来走向和将来的演变趋势，为现实的语言生活服务。有的学者曾经由此预测过攀枝花市方言的未来发展趋势，并提出相应对策，就是一个很生动的例子。

“纵横比较分析法”贯穿于方言调查研究的始终。从田野调查的声韵

调记音开始,记录方言的声调分类(调类)差别,就得从古四声跟今四声的比较、从古声母清浊跟今声调的比较开始。确定方言声调高低升降(调值)差别的五度制不是随便确定的,是需要跟周围的方言,跟其他的方言,跟共同语比较才能确定的。记录《方言调查字表》就是自觉进入方言与古音《切韵》音系的比较,至于具体音值的确定,还得跟周围方言、其他方言比较。词汇语法的调查研究也大致如此。最后要说说某个方言的特点,所有方言的特点都是相对的,都是比较着古今,比较着其他方言,比较着共同语说的。如果没有比较,就很难说清楚方言的特点,也许所要说的方言就没有特点。

“纵横比较分析法”也贯穿于方言研究的各个方面。上面举例说了方言语音的调查研究离不开纵横比较分析法,其实方言调查研究的所有领域都离不开这个方法。再举词汇的调查研究为例,我们从《现代汉语方言词典》42种分卷本的比较知道,汉语方言里“脖子”的说法至少有24种:脖子、脖颈子、颈亢、颈子、颈项、脖颈、颈脖、脖项、板颈、颈梗、颈骨、头颈、颈、颈根、颈颌、颈牯、颈筋、仲仲、项、颌管、头蒂、蒂、扣颈、脰颈,其中“脖子”和“颈”的说法最普遍。“厨房”的说法至少有27种:厨房、饭屋、灶库、锅屋、锅上、锅间、灶屋、灶房、灶火、厨屋、饭厦、伙房、灶下、灶披、灶披间、灶头间、灶跟、镬灶间、镬头、茶廊房、厨下、灶前、□^① [tsak¹¹] 下、灶边、下间、鼎间、灶,其中“厨房”的说法最普遍。《现代汉语词典》既收录了“脖子”,又收录了“颈”,但只收录“厨房”,说明这部词典的编者非常高明。我们说把整座房子叫“厝”是闽语的特征词,是因为在调查比较了已知的汉语方言记录之后,凡是属于闽语的方言都把整座房子叫“厝”,凡是不把整座房子叫“厝”的方言都不是闽语,还没有发现有例外的。这个特征词对于闽语具有唯一性、排他性的特点,符合方言特征词的严格定义。

这些例子已经可以说明“纵横比较分析法”是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根本方法。时下所看到的研究生论文,或以这些论文为底子出版的方言研究论著里,经常列有“研究方法”的章节,其中列有“田野调查法”“统计分析法”“数据库法”等汉语方言研究的方法,其实这些都不是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方法,甚至都不能称之为方法。田野调查是方言调查研究的基础,还是考古学、社会学、生物学等许多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的基础;统计分析主要应用于经济学领域,方言研究偶尔可以列点数据,但

跟统计分析并不相干；至于数据库是一种储存数据资料的仓库，能说这是一种方法吗？所以说方法论不要勉强凑数，不要勉为其难。

四 摆事实，讲道理

李荣先生在《方言研究中的若干问题》(1983b)一文中说：“研究语言，跟研究其他事物一样，无非是六个字：摆事实，讲道理。”这是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一条基本法则，这条法则由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本体论和方法论所决定的。

先说“摆事实”。这是由方言调查研究的本体论所决定的。很多语言学、方言学的论著有的只摆事实，例如李方桂的《龙州土语》《武鸣壮语》，赵元任的《台山语料》，董同龢的《四个闽南方言》几乎全是语料，仍然不失为经典之作。这里的关键是怎么“摆事实”，会不会把事实“摆”好，“摆”得合理，“摆”得合乎规律、一目了然，“摆”得方便解释。对事实“摆法”不同，出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这是学问，不是谁都会的。拿广州话的语音系统来说（李荣 1983a），如果把 [i、u] 独立出来算作韵母，则广州话声母只有 16 个，没有 [ku、k'u、u、i] 4 个声母；但韵母则多达 94 个，有一批齐齿呼和合口呼的韵母；如果把 [i、u] 算作声母，则广州话的声母就是 20 个，多了 [ku、k'u、u、i] 4 个声母；但韵母则大为减少，只有 59 个，除了 [i、u] 单独做韵母以外，几乎就没有齐齿呼和合口呼的韵母了。这两种“摆事实”的结果都是对的，不过前一种摆法比较符合一般的习惯（元音只做韵母），方便于广州话跟其他方言、跟普通话的比较；后一种摆法可能很多人不习惯（元音做了声母），但却方便于说明广州话语音结构的特点。白宛如的《广州话方言词典》（1998）单独讲广州话声韵调的时候用前一种摆法，讲语音结构时用后一种摆法，两者都兼顾了，在这里，元音 [u、i] 可以做声母。巧得很，湖南浏阳南乡话（夏剑钦 1983）把 [u] 也列为声母，因为南乡话中 [u] 介音是不拼辅音声母的。有人以为汉语的声母都必须是辅音，就是不知道灵活摆事实的道理。

再举福州话的韵母摆法来说。福州话的韵母跟声调之间存在十分复杂的关系，就是调类是平声（阴平、阳平）、上声、阳入的读“紧音”韵母，调类是去声、阴入的读“松音”韵母。如果不考虑声调，福州话韵母也多

达 90 个, 可以跟其他方言一样按照四呼摆放; 如果考虑声调, 可以把“紧音”和“松音”合并, 福州话韵母只有 49 个, 就不能兼顾四呼摆放。梁玉璋《福州方言的“切脚词”》(1982) 一文, 为了说明“切脚词”的语音规律, 把福州话的韵母摆放分为四类, 跟其他方言的韵母表都不一样。再来说说河南北部获嘉方言的韵母摆法 (贺巍 1982)。获嘉方言基本韵母 47 个, 但是在实际的语言生活中这 47 个韵母是随着词类性质的不同而变化的, 产生了 36 个变韵, 韵母的数量多达 83 个。因此讲获嘉方言韵母的摆法, 首先得分为基本韵母、Z 变韵母、D 变韵母几类, 此外还得列出儿化韵母、合音韵母、轻声韵母, 这个摆法够复杂了。

类似于广州话、南乡话、福州话、获嘉话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这些例子都说明, 摆事实并无一定之规, 不能墨守, 要学会灵活应用。即使很多人认为很简单的声母表、声调表、同音字表, 也不是随便摆的, 要摆出方言的语音结构规律, 摆出方言的语音演变规律, 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研究方言的人都知道, 方言词汇研究、语法研究这方面的例子也很多。

再说“讲道理”。什么叫讲道理? 李荣先生说: “讲道理, 那就是理论了。”^②说得简单一些就是分析事实、解释事实, 这是由方言研究的方法论所决定的。上文说到的广州话、福州话、获嘉话的韵母问题就是对语言事实的一种分析, 这种分析是为了方便于解释语言事实。在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中, 有很多事实需要解释, 但最基本、最重要的是通过事实解释方言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如果研究一个方言, 把它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说清楚了, 那么也就做到了对这个方言的基本解释。进一步说就是要综合解释, 综合解释就是要讲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的互动关系。举一个李荣先生曾经举过的例子 (李荣 1983b), 兰州话 $[-_c f -_c f -_c v -]$ 和 $[-_c \text{ʃ} -_c \text{ʃ} -_c \text{ʒ} -]$ 阴阳调类并存。例如:

阴阳上去	阴阳上去	阴阳上去	阴阳上去
[fei] 飞肥水睡	[fē] 栓凡反犯	[fa] 方房访放	[ʃ ə] 生神省胜
[vei] 危维尾味	[vē] 剌完软万	[vā] 汪亡网忘	[ʒ ə] 扔人忍刃

首先这是一个事实, 青海西宁话、河南济源话、贵州贵阳话都有类似的事实。其次要解释这个事实。兰州等方言的这个语音结构里, $[-_f \text{ʃ} -]$ 的阴阳平调对立来自古声母的清浊对立, 容易解释。但是 $[-_v \text{ʒ} -]$ 是浊音声母, 怎么也有阴阳调的对立呢? 这跟很多方言 (如吴语) 古今语音演变的

规律不符合呀？李荣先生说：“这个事实得用语音演变的道理来解释。说穿了不过几句话：语音是变的，语音系统也是变的。”^③古今音清浊声母相配成对的关系不是永恒的，相配成对的情况在方言里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再举山西长治话的入声调来说。侯精一（1983）记录长治话有6个单字调：阴平、阳平、上声、阴去、阳去、入声。其中的入声很有意思。入声都带塞音[-ʔ]尾，读短调，读单字的时候入声是不分阴入和阳入的。但是在“子”尾、“底”尾前，逢古清音和次浊声母字今读[-ʔ] 44短调，可以认为是阴入；逢古全浊声母字今读单字调[-ʔ] 54短调。那么，从古今声调演变规律比较出发，也为了汉语方言比较的方便，我们可以认为长治话实际上也有8个声调，入声可以分别为“入声、阴入、阳入”。这种分析是符合长治话的语言事实的。

这两个例子说明，分析事实、解释事实要从语言事实出发，坚持实事求是，不能太过拘泥。从这一点上来说，方言的调查研究是一种能力和知识的结合。你的研究水平有多高，就看你能在多大程度上观察事实、分析事实、解释事实。不过，我们要明白：世界上的现象太复杂，很多现象是无法解释的，起码是现在还无法解释的，所以才有那么多的“自然之谜”“历史之谜”“宇宙之谜”“人类之谜”。语言方言也如此，汉语方言里很多事实现在也是还无法解释的。所以在“摆事实，讲道理”这个问题上，只摆事实，摆的确实是事实，不见得不好；不摆事实，只讲道理，不见得就一定好；“会逮耗子的猫是不叫的”，既摆事实，又讲道理，融为一体，不专门标榜道理，很可能是最好的。总之，我们要坚持三点论：第一，摆事实是基本要求；第二，鼓励解释事实，讲出道理，只要尽力，不要勉强；第三，对于解释错了的，道理讲错了的，要理解，要宽容，要讨论，不要打棍子。

五 正误之辩

方法和理论本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但实际使用的时候，有时很含混，分不清楚。有一种颇为流行的看法，认为西方是讲方法和理论的，中国不太说方法和理论。这个看法不太全面，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也是讲究方法和理论的。老子《道德经》五千言，《孙子兵法》六千言，所包含的方法和理论之广泛和深刻，至今仍为中外所推崇。史学领域里的“二重

证据法”，至今仍被史学界奉为圭臬，没有觉得过时。语言文字领域里的“六书说”“系联法”；汉语音韵学里的“指掌图”，五个手指代表“唇牙舌齿喉”五音，讲通了汉语的音韵结构。所有这些方法和理论，今天也让我们叹为观止，不佩服都不行。中国传统文化里的方法和理论，注意结合中国的实际，从中国的文化环境出发，不尚空谈，自有其长处。对此我们需要自信和自尊。

这些年来，西方向我们输入的方法和理论很多，这本来是好事。不过，也有一种倾向，就是完全用西方的方法和理论来衡量我们的传统优势学科，这就不免有些偏颇，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也因此面临挑战。有一种意见认为，汉语方言研究也要与世界接轨，现在研究方法太保守了，例如主张我们应该像调查印第安人语言、调查太平洋海岛上的土著语言一样，直接记录大量语料，然后整理语言系统，不要再用《方言调查字表》记音，用《词汇调查表》记词汇了。总之，我们的方法和理论落后。

君知其一，不知有二。在中国语言学的各个学科里，汉语方言学是继汉语语法学之后最早接受西方方法和理论的学科之一。例如，引进了国际音标记音法代替了传统的音切法，使方言的田野调查和语音记录大为进步；引进了“音位”理论，使方言的语音分析多了一种非常好的选择。但是，引进这些先进方法和理论之后，我们并不全盘照搬，而是消化、吸收，并且与汉语方言的实际相结合。例如，根据汉语方言的实际，在国际音标的基础上加上了传统的“发圈法”记录调类，用独立创制的“五度制”记录实际的调值，2004年“发圈法”和“五度制”等25个符号成功地成为国际标准，得到国际公认。又例如，“音位学”方法或理论其实很简单，讲的就是“对立”和“互补”四个字，“对立”指在相同的语音环境下出现，“互补”指在不同的语音环境下出现，对立的音属于不同的音位，互补的音有可能归并为同一个音位。在分析研究汉语方言的时候，必须再加上两句话：不同音位的音类一定要分开，相同音位的音类不一定必要归并。加上后面两句话的意思，就是汉语方言的语音分析需要遵守“从分不从合”的原则，否则进行方言比较的时候就会碰上困难。再例如，汉语方言调查研究坚持使用《方言调查字表》，这是因为这个字表是根据《切韵》系统整理的，它最有效地反映了汉语方言的发展和演变的古今继承性。研究汉语方言有非常成熟的音韵学，有《切韵》系统做背景，这实在是一件幸事。《词汇调查表》按照词义和词类分类，非常方便于联想和

类推，可以最有效地保证词语记录的全面性。这些都是既符合汉语方言实际，又经过近百年的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方法，为什么要拒绝呢？印第安人的语言，太平洋海岛上土著人的语言是完全不具备汉语方言所拥有的历史文化条件的。

接轨是双向的，单向的输入不是接轨。汉语方言学也以自己独特的丰富方言资源，进行反向输出，其重要特征就是建立自己的话语权。上文说到 25 个符号成为国际标准，就是争取话语权的一例。《中国语言地图集》建立“方言大区—方言区—方言片—方言小片—方言点”的五级分类法，代替“方言—次方言—土语”的三级分类法，是争取话语权的又一例。与此同时，我们建立了具有自己特点的名词术语英文翻译系统。例如，五级分类法分别翻译为：super-group, group, sub-group, cluster, dialect, 各方言区的命名除了官话照顾习惯翻译为 mandarin super-group 外，其他方言区都直接用汉语拼音译名，如 Min group（闽语），Yue group（粤语），Wu group（吴语），等等。涉及音韵学上的术语，也大多直接用拼音命名，后加写汉字，如 bang（帮）、pang（滂）、bing（并）、ming（明），等等。西方学者要调查研究汉语方言，应该采用这套术语系统，应该按照我们的话语表达方式。在汉语方言研究领域，我们争取到了必要的话语权。这个话语权很重要，有学者正确地指出，是由别人译还是由我们自己译，是迎合性地翻译给别人，还是真切地翻译出自己，这个关系到“是否发出中国自己的理论声音”。

附注：

①有音无字用“□”标识。下同。

②③见李荣《方言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方言》1983 年第 2 期。

参考文献

[1] 白宛如. 广州方言词典 [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2] 贺巍. 获嘉方言韵母的分类 [J]. 方言，1982（1）：22-36.

[3] 侯精一. 长治方言记略 [J]. 方言，1983（4）：260-274.

[4] 姜延军. 发出中国自己的理论声音 [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08-09（4）：1.